

陈炜湛

语言文字论集

陈炜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

陈炜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陈炜湛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0

ISBN 7-5325-4096-0

I. 陈... II. 陈...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汉字—文字学—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5104号

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

陈炜湛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 插页 5 字数 280,000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5-4096-0

H·32 定价:36.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64580324

## 自序

先贤有言,治学既忌杂,亦忌窄。杂则不专,精力分散,难望有成。窄则局于一隅,孤陋寡闻,不成气候。然则何谓杂,何谓窄,实亦因人而异,且杂与博,窄与专亦难截然分清。我自问才智平平,能力有限,确不敢擅自涉足诸多领域,但又不甘自缚手足,终生仅与甲骨文为伴,只与古文字打交道。且语言文字有古有今,错综复杂,如何以古为鉴,用之于今,也颇值得研究、探索。是以我的研究虽以甲骨文为主,但也稍稍旁及古文字学的其他分支以及文字的书写(书法)与规范乃至语文现代化的相关问题。总体而言,仍未出语言文字学的范畴。收入本集的文章,便是我二十余年间于甲骨文外“旁及”的结果与见证。就其内容而言,大致有四个方面:一、传统语言学及学术史,二、竹简、石刻文字,三、书法篆刻,四、语文现代化。此外,还有一组文章,记述的是前辈大师对我的教诲与指导和我所忆及的大师们治学为人的一些侧面。1986年冬,在北京西山举行的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上,蒙殷焕先前辈不弃,赐我四字,曰“学有本源”。收录这组文章,用意与编《甲骨文论集》时将三篇研读先师论著之心得收入全同,即志师承而寄缅怀之忱,复以示学之本源也。

卷内诸文,若问“题目”从何得来,则又有几种不同的缘由。一、平日静心读书的积累。先有点滴心得体会,而后约而为文,拟一题目。如关于包山与郭店楚简、《穆天子传》、《诅楚文》、碧落碑以及《文赋》诸文。二、他人命题,恰合己意。《商承祚先生与简牍学》堪为代表。三、学术灵感,“心血来潮”,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关于汉字简化与规范化的文章大体属此类。四、发现明显谬误的对立面,非争非鸣不可者。关于汉字“冤案”的评析,萧、肖二字之考辨便属此类。五、应邀就某题目作学术讲演,退而删繁就简,整理为文。《书法美学漫谈》一文即由此而来。不论何种缘由作文,所论容有不当,然执笔之时均未敢草率从事也。此次辑而为集,为存原貌,仅作文字上的校订,内容则不加改易。关于《诅楚文》之争议,则别撰补记附诸文末,以谢论辩者。

限于学识,卷内之疏漏错误恐仍不少,切盼读者不吝赐教,俾得日后改正之,是所至祷也。

陈炜湛序于广州中山大学三鉴斋

2005年1月7日

## 目 录

|                                  |     |
|----------------------------------|-----|
| 自序·····                          | 1   |
| 论传统语言学的分合及其在新条件下的发展·····         | 1   |
| 许学管窥·····                        | 8   |
| 论王筠对文字学的贡献及其治学特色·····            | 14  |
| 清代杰出的古文字学家吴大澂·····               | 26  |
| 商承祚先生与简牍学·····                   | 36  |
| 文字训诂论集序·····                     | 45  |
| 战国以前竹简蠡测·····                    | 48  |
| 《穆天子传》疑难字句研究·····                | 55  |
| 包山楚简研究·····                      | 61  |
| 郭店楚简的启示——读《郭店楚墓竹简》札记·····        | 74  |
| 诅楚文献疑·····                       | 82  |
| 碧落碑研究·····                       | 94  |
| 碧落碑中之古文考·····                    | 104 |
| 书法美学漫谈·····                      | 116 |
| 古文字与篆刻·····                      | 126 |
| 书家与学者·····                       | 133 |
| 请正确书写古文字——向书法家进一言·····           | 136 |
| 关于唐写本陆机《文赋》·····                 | 140 |
| 我对汉字前途问题的一些看法·····               | 144 |
| 附录 在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 151 |
| 书法家与简化字——纪念《汉字简化方案》公布 35 周年····· | 153 |
| 社会用字规范化与领导垂范·····                | 157 |

---

|                              |     |
|------------------------------|-----|
| 论汉字规范化的全民性·····              | 167 |
| 《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评析····· | 173 |
| 汉字简化始于甲骨文说·····              | 186 |
| 萧肖考辨——兼论姓氏用字规范·····          | 193 |
| <br>                         |     |
| 高山仰止——忆陈望道先生二三事·····         | 197 |
| 怀念容庚先生·····                  | 200 |
| 忆容庚师·····                    | 203 |
| 商承祚教授的治学道路·····              | 209 |
| 悼念吾师商承祚先生·····               | 213 |
| 夕阳红胜火——商承祚先生晚年生活片断·····      | 216 |
| 岭南松柏 容商二老·····               | 220 |
| <br>                         |     |
| 附录一 我如何教古文字学·····            | 225 |
| 附录二 如何学习和研究古文字·····          | 229 |

## 论传统语言学的分合及其 在新条件下的发展

我国传统语言学,素称小学,民国以来又被人们视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曰核心部分。从小学的角度说,这门学问发端于先秦,创立于两汉,全盛并终结于清代。民国以来,现代语言学渐占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语言学的各个组成部分——习惯地分为文字学(含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部分,均呈式微之势。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传统语言学才出现了新的转机。1978年12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率先成立于长春,并举行首届学术讨论会;1981年5月和10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和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又相继成立于武汉。近10年来,三个研究会分别举行了多次年会及学术讨论会,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初步展现了令人欣喜的前景。为了进一步振兴国学,使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有较大的发展和突破,1988年4月,广州高等院校部分从事文字、音韵、训诂学教学和研究的同志经过反复酝酿,成立了广州国学研究社,推举李新魁、曾宪通两位教授为正副社长。这实在是件大好事,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为此,本文拟就传统语言学走过的道路及现状来论证今日成立国学研究社,倡导各学科互相渗透、联合攻关的必要性,论证传统语言学在新条件下蓬勃发展的可能性,以此就教于研究社诸同志及关心国学前途的读者。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

传统语言学——小学之所以能形成并成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汉语的记录形式——方块汉字的特性决定的。汉字形音义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字形、字音、字义各自的演变决定了对文字的研究成为语言学的先驱,其中对字义的解释尤其首当其冲,成为通读经典的首要条件。汉字由篆书演变为隶书——即所谓隶变之后,文字便有今古之分,字形与字义的联系更其微弱、隐晦,二者的矛盾更为突出,致使经书更为难读。又由于古文经的发现,汉代的儒家经典也有了今文古文之分。为了解经,出现了以《尔雅》为首的义书和以《说文解字》为首的字书。诚如胡奇光同志所指出,中国传统语言学从一开始就以汉字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为研

---

\* 古文字学旧称金石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可理解为文字学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古文字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与音韵、训诂仍有极密切的关系,故本文把它和文字学同归于传统语言学的范畴。

究核心,就是为解释经典服务的,它以研究古代语言文字为主。当初也无所谓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一部《说文解字》便既分析字形又解释字义,有时又兼及字音(如言“读若”、“读为”)以明假借。至东汉末年,随着梵文的输入,受梵文字母的影响,产生了孙炎的《尔雅音义》,用反切拼音注字;魏晋以降,考究声律,出现了韵书,由此逐渐分化出音韵之学。宋代以后,才明确地将“小学”分为训诂之学、偏旁之学及字书之学、音韵之学,分别以《尔雅》、《说文解字》、《广韵》为代表著作<sup>①</sup>。

“小学”到了清代乾嘉年间,确已登峰造极。关于清代的学术成就,论者甚多,毋须多说,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这一时代,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在一些学者手上又“合”起来了。综博《说文》之学、《尔雅》和《方言》之学、古韵唐韵之学三者,“得其条贯”者始于休宁戴震(章炳麟语)。正是由于出现了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朱骏声等一批学者,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三者,并把它们结合起来,做到形音义三者互推求,实现了新的“综合”,小学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产生了许多值得后人称道的辉煌巨著。清代小学的成功,实乃各分支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者互相渗透密切结合的结果。这是中国语言学史上极可宝贵的经验之一,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这里,有必要对“终结”之说稍作讨论。所谓终结,从时间上说,主要是指为解经服务的小学结束于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从学科本身而言,则是指以下三点:(1)既已登峰造极,方法也已用尽,便难再前进(段玉裁等人的以经考字、以字考经、以群经校一经、以许注许;王念孙父子等强调以音求义,据上下文校字释义;江永、戴震、江有诰等倡导据《诗经》用韵及《说文》谐声偏旁以考求古音,都是很好的方法)。(2)学术思想大转变。道光咸丰以后,经学研究的动向,是反对东汉古文经学而恢复西汉今文经学,不讲求名物训诂而注重微言大义,“反对古文经学之日就是小学衰落之时”<sup>②</sup>。(3)新学科兴起,重心转移。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文字研究的重心迅速转向古文字,以《说文》为中心的“许学”也即宣告终结;由于西学东渐,逐渐形成文法学、文体改革、文字改革等语文新潮,成为语文研究的重心所在。所以,说传统语言学——小学“终结于清代”,是有特殊含义的。终结者,告一段落之谓也,它绝不等于消亡。

可以肯定,传统语言学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消亡的。只要方块汉字存在一天,其形音义之间的矛盾便存在一天;只要以方块汉字记录的古代典籍存在一日,解读这些典籍的学问也须存在一日。事实上,民国以来,不论音韵学、文字学还是训诂学,在新的形式下亦有发展,取得不少成就。如音韵学方面关于上古音韵部、声类、声调的研究及音值的拟测就日趋严密,已非清人可比;文字学方面对字形字义的分析,对汉字形体结构及其演变的研究,就其实质而言,不仅超过了段玉裁,而且已远

远超过了许慎;训诂学方面对古书疑义的辨析、对古汉语词汇的考证以及方言的调查研究也均有进展。不过,这些成就往往不记在“小学”的账上罢了。再则,专家多而通才少,兼文字音韵训诂三者而得其条贯者虽有而不多,故从总体看,几十年间的成就还形不成足以与清代抗衡的新的高峰。

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业已表明,要使传统语言学有新的突破,巨大的发展,三个分支学科之互相渗透,紧密结合,在新的条件下——高层次上实现新的综合,乃是首要条件。而从现实考察,传统语言学的几个分支学科也已到了非互相渗透、取长补短不可的地步了,它们在各自发展过程中都碰到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下面试举例说明之。

(1) 音韵学。请以古音研究为例。古音研究中,目前存在许多难以统一的分歧,单靠老办法(如《诗经》用韵与谐声偏旁)已难奏效。据李新魁同志《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所论,目前“有较大分歧”的问题便有九个,如:古韵到底该分为多少部,一部之中的元音只能有一个还是可以有发音相近的几个,是否同部一定是主要元音相同,元音是否有长短或松紧之分。上古有没有介音,介音有多少。有没有复辅音,复辅音结合的范围及规律如何。上古音的声调到底有多少个,有没有去声,上声、入声的分类和音值如何,等等。在谈到“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上古音研究”时,李文提出四点意见,其第一点即为:“必须充分利用古文字学研究的成果,把对古文字的研究与古音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古文字(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所提供的材料和所展示的问题,运用到古音的研究上来,特别是谐声系统和假借字系列必须进行新的、更深入的研究,找出确切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古音的研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佐证。”<sup>③</sup>这是当代音韵学家的意见,非常中肯。因为目前的古音研究,大体上还是依靠《诗经》用韵与《说文》谐声偏旁,而《诗经》音既非一时一地之音,《说文》谐声也是历史的堆积,时、地矛盾同样突出;据《切韵》、《广韵》上推古音,也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周秦古音的现实。与此相对,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既未经后人窜改,时间、地点的范围又较确定(如殷虚卜辞、西周金文、云梦秦简、临沂汉简),实在是研究古音的绝好材料。有些资料,古文字学者司空见惯,熟视无睹,可是一旦用音韵学的眼光加以审视,就成了古音研究的宝贝,或为成说提供佐证,或引起对成说的怀疑,成为新的研究线索。如终与冬,立与位,女与汝,古文字中均同字,直到临沂汉简还是终作冬,位作立,汝作女,可见仍是同音字,但目前所见的一些上古音字表却并不在同一的音韵位置上<sup>④</sup>。出现这样的矛盾倒是好事,或是修订上古音字表,或是对古文字资料作出合理的解释,二者必居其一。

(2) 训诂学。从近年来出版的若干训诂学著作,大都停留在阐述前人的训诂

经验、方法、条例、术语上(这当然是必要的)来看,如何吸收当代语言学的先进理论和科学方法,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使训诂学更为科学化、系统化,仍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以往的训诂学注重上古汉语的研究,今人虽有开拓新领域之说(如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词语的研究),或提出新的课题(如译语研究),但号召还不力,实践者也还不多。目前训诂学中的“形训”和“义训”大体上仍是跟着《说文》、《尔雅》转,以汉代人之为是非为是非,如《说文》、《尔雅》错了也只得跟着错下去。如对“禽”与“兽”,便只能说“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其实禽兽二字的形与义古今变异很大,《尔雅》、《说文》的解释均有失误<sup>⑤</sup>。有些字,虽然古训无误,但若不追溯其古形,也难知其所以然。如“自”,《说文》:“鼻也,象鼻形。”自之本义为鼻,典籍无证,段玉裁认为“用自为鼻者绝少”。在古文字学者看来,“自”为鼻之象形毫无可疑,可在一些训诂学家看来,至今仍是不可思议,只能“以俟识者解之”。又如败北之“北”与南北之“北”,用法殊异,要圆满解释这一现象,也非单靠训诂学所能济事<sup>⑥</sup>。再如训诂学著作中常常谈到的“反训”,以反义词互相解释,始于《尔雅》,郭璞谓“美恶不嫌同名”,当代有的学者则说“从这种反义相训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训诂也有一点朴素的辩证法”<sup>⑦</sup>。其实,若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反训”多有可疑,象“乱,治也”,“臭,香也”之类便是明显的错误,今日沿用,不免显得陈旧。对于“反训”,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但涉及具体词例时就有不少值得重新考虑的问题。由于汉字的特殊性,语音变异与字形无关,一个词又有多种记录形式(一音同义多词),或分化为若干个同义近义词。如不从语音上考察——借助音韵学的原理,对多音词、同源词的考辨同样会困难重重。

(3) 文字学(古文字学)。试以甲骨文研究为例。我在《甲骨文简论》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对今后甲骨文研究的展望与设想”中提出过八个方面的问题,谈到“通过甲骨文研究上古汉语”时曾说:“必须结合可靠的文献资料,深入研究卜辞(及记事刻辞)的文法、词汇,还要积极想办法研究其语音。突破这一难关,单靠古文字学家不行,还要靠音韵学家的努力,二者互相配合,方可奏效。”<sup>⑧</sup>这是就总的方面说的。甲骨文许多“《说文》所无”之字,形体结构可以辨明,字义字音则难以确定。特别是由两个偏旁以上下结构或左右结构组成的字,即使估计它们是形声字,也难以决定其何为声符(声旁)何为义符(形旁)。有些常用字,似乎形音义都清楚,但到了具体的卜辞文句里,其音其义却又显得不怎么清楚了。如“鼎”,除用为贞卜之“贞”外,还常见于命辞,用法很复杂,既是名词,又可作动词,有时似乎又是副词,词义迄未考定,以致一位外国学者专门写了文章来华问“鼎”<sup>⑨</sup>。与此相关的“贞”,《说文》解释为“卜问也”,当是其古义,与典籍有关资料也能相合,可近年来一些外国人提出,“贞”是贞测、拟测之意,于是引出甲骨卜辞之命辞是否为问句

的大问题。国内也有学者表示赞同。像这类牵涉到对卜辞性质的认识,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大问题,光从古文字学的角度,从字形分析的角度,自然是很难解决的,它需要有训诂学、音韵学的帮助。再如“龙”字,甲骨文亦屡见,除用作人名(龙甲)外,常称“有龙”、“不其龙”、“鼎龙”,显然不是指神话传说中的龙,那它又是什么字的假借呢?离开音韵学,一筹莫展;运用音韵学原理去“破读”,有人读为宠,有人读为凶,还有人读为眈,各有所据。如何正确运用音韵学原理,运用并检验古音研究的成果,很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

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的上述实例说明,学科之间的联合、渗透,确是刻不容缓。

所谓联合、渗透,说到底,是个“合”的问题。实际上,在学术研究领域里,从宏观考察,学科的分化与综合是经常出现的现象。一般而言,为研究方便,常取分的形式,以解决其具体、特殊的问题。但是分久必合。唯有同一学科各个分支或相邻学科之间的“合”,方能研究共同性的问题,规律性的问题,以便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概括归纳,丰富原有的学科理论与体系。这种分合现象即使在某一分支学科中也是经常出现的。试以古文字字典的编纂为例。清末吴大澂著《说文古籀补》,取综合法,凡有可补《说文》古籀之未备者,不论金石陶玺货布,兼收并蓄。本世纪以来,在罗振玉、王国维倡导下,古文字研究多取“分类法”,学者多专治一种或两种古文字,所编工具书则是某一种古文字的字汇,如《殷虚文字类编》、《金文编》、《甲骨文编》等等。每一部书都很专,都有其学术价值,但每一部书都不能反映古文字的全貌,也不能圆满反映某一时代(时期)的文字使用实际。80年代以来出版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古文字类编》二书,凡属商周古文字而有代表性的,不论甲骨铜器竹帛玉石陶玺货布,一概收录。从表面上看,似乎回复到了《说文古籀补》的收字原则,是倒退。其实大不然。经过“分”之后的“合”,已进入一个新的层次,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了。与此相应,在分门别类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概括,新的古文字学也比原来的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了。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还往往有这样的情形: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来似乎毫不相干的学科马上显得关系密切,出现了“联合攻关”的必要性。如50年代在安徽寿县发现楚国的鄂君启节(计舟节二,车节三)。其铭文牵涉到战国时代楚国水陆两路许多水名,地名;70年代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钟磬铭文牵涉到音乐乐理,对这两宗古文字材料的研究,就需要历史地理学、音乐史的帮助,就要求研究者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或有这些方面的专家参与此事。否则,就无法圆满释读这些铭刻,正确认识它们所包含的内容。

越是要解决大的难题,牵涉面越是广泛,越是需要多种学科的联合。同一学科

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如此否定之否定,螺旋形上升,乃是学术研究发展的规律之一。文字学(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传统语言学的几个组成部分结合起来,以全面研究古代语言文字,探明其演变轨迹为目标,联合攻关,其功效自非三者之中任何一个分支所可比拟。所谓联合,可以是三方面的学者共同研究大家关心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同一个问题,也可以是研究者综合运用三方面的知识、手段以解决疑难问题。后者尤为重要。我国语言学界的现状之一,就是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三者,一身而三任焉的学者越来越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提倡学者互相学习,学科互相渗透,希望音韵学家训诂学家也研究商周古文字资料,文字学家古文字学家也研究古音及古书训释问题,便显得十分必要了。广州国学研究社的成立,正是为此。

以研究上古汉语语言文字为中心的广州国学研究社成立后,一些朋友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你们搞的国学与旧的国学是一回事吗?与清代的朴学是一回事吗?

既称国学,新旧之间总有联系,既有新旧,当然也就有所区别。所谓联系,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即均以古代的语言文字、古代的语文事实为研究对象。二是指继承性。新国学继承并发扬旧国学(朴学)的优良传统,如形音义结合互推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等;新国学以旧国学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为自己的基础,由此出发以求新的突破。至于区别,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目的。旧国学以解经、明经为目的,“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新国学则于“明经”——读通古籍之外,还要进而达到“上古汉语明”和“古代社会文化明”,并且努力做到古为今用,为建设今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2. 方法。旧国学的方法“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戴震语),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即取此二语而已(陈焕《说文解字注跋》)。段氏又强调以许注许,形音义互推求,王念孙强调因声求义及据上下文释义等等,都是在同一平面上爬梳,有其合理正确的部分,理应继承。新国学则强调形音义三结合,考释文字、探索字源词族,都要兼及形音义三者作综合考察。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新国学以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作为自己的向导,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这是旧国学所无法比拟的。

3. 资料。旧国学以文献典籍——群经为研究资料,新国学则除群经之外还有大量的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竹帛文、石刻文等)作为研究资料,可将传世的与地下出土的两种研究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参证。此外,新国学还注重活的语言资料——方言的收集与整理,作为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参考。

新国学比起旧国学来,既有新的目标,又有先进的方法和极为丰富的新资料,

在客观上确已具备了取得超越旧国学的研究成果,出现新的学术繁荣局面的条件。换言之,传统语言学——“小学”在今后再出现一个黄金时代是有可能的。剩下的问题便是并世学者们的主观努力了。愿这样的学术繁荣局面早日到来,愿广州国学研究社为它的到来而努力奋斗,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88年6月5日在广州国学研究社讲,

7月据讲稿整理成文,9月修订。

(原载《学术研究》1989年第1期)

- 
- ①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2—3页。
  - ② 同①,第230页。
  - ③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1版。
  - ④ 参见赵诚:《商代音系探索》,《音韵学研究》第一辑。关于这六个字的上古音与中古音,可参看郭锡良编《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及丁声树编《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中华书局1981年10月新1版)二书。
  - ⑤ 说详拙著《汉字古今谈·禽兽小考》,语文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110—115页。
  - ⑥ 说详拙著《汉字古今谈·败北与南北》,语文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116—119页。
  - ⑦ 见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116页。
  - ⑧ 见拙著《甲骨文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230页。
  - ⑨ 高岛谦一:《问“鼎”》,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四届年会论文,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1月第1版。

## 许学管窥

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形体结构,说解其意义的字书,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辉煌巨著,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它开创了据形系联归纳汉字的部首制,为其后词典、字典的编纂奠定了基础;它保存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既是汉代人所见小篆及古文籀文的总集,又是进而研究商周古文字的钥匙和桥梁。它为九千三百多个篆文所作的解释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无不涉及,故又是研究古代社会、古代语言的绝好材料。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说文》屡经传钞、翻刻,难免讹误错漏,于是逐渐出现了版本、校勘的问题;同时,如何理解许慎对文字的“说”、“解”原意并给予恰当评价,如何认识《说文》所提供的语言、文字资料,并加以利用,也都成了问题,需要学者们研究、探讨了。易言之,《说文》由于其特殊的重要性,又是历代学者倾注精力研究的对象。对《说文》及其作者的研究也就成了一门学问,称为“《说文》学”,人们通常称之为许学。

同其他学问一样,许学也有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时兴时衰的历史。

根据许慎自叙,《说文》一书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由其子许冲奏上朝廷。时当东汉中叶。其后经三国、晋而隋、唐,《说文》由备受重视而渐趋冷落。《说文》面世后,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应劭著《风俗通义》、晋灼注《汉书》均先后称引之;在《说文》的启示下,晋·吕忱撰《字林》六卷补其漏略,梁·顾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广其部类。梁·庾俨默作《演说文》一卷,《隋书·经籍志》并著录《说文音隐》四卷,均为许书而作。之后,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孔颖达、贾公彦等撰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正义》,李善注《文选》,亦均援据《说文》,诠释字义。这些,都是在学者中“备受重视”的证明。但是,《说文》所“说”乃小篆,其时隶书行之已久;东汉以后,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又大大发展起来,特别是楷书,成为新的规范字体,《说文》在读书人中流传的面也就随之逐渐缩小。兼以魏晋以后音韵之学盛行,事章句者传训诂,工词藻者资声韵,《说文》与一般的读书人已无多大的关系。后来经赵郡人书法家李阳冰于大历年间(766—779)将《说文》重新整理,刊定为二十卷,许学又一度中兴。又由于李氏自恃过甚,自以为篆书“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乃“修正笔法”,对许书颇有改动,并喜欢讲些与许慎不同的意见,千百年来竟担了个“窜

乱”、“擅改”的罪名。其实,从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祛妄”卷所列五十六文之“妄”看,真正经李阳冰改动的篆文仅“頁”、“矛”二篆,又“槩”、“要”二字未见李阳冰之说,其“以师心之独见破先儒之祖述”者五十二字,有“破”错的,也有说对的(如对龠、封、亥等字的解释)。可见李氏对《说文》确实下过一番功夫,他“是第一个敢于对许慎的说解大胆提出怀疑,并明白地表达自己不同见解的学者”<sup>①</sup>。

李阳冰刊定的《说文》,今已不传。现在能看到的唐写本《说文》,只存木部残卷一百八十八字,其篆与今本相异者有五字(今本相、栲、椎、檄、楷,唐写本作杞、楸、樵、檠、槩),说解则与今本大同小异。此卷经学者据唐代避讳之例考证,知当写于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穆宗登极之岁,尚在改元长庆之前。

到了南唐、宋初,由于徐锴及其兄徐铉二人对《说文》的研究、重校,《说文》得以再度流传。徐锴,字楚金,南唐时任秘书省正字、内史舍人,著《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世称小徐本。其中通释三十卷,“考先贤之微言,畅许氏之玄旨”;部叙二卷,论五百四十部“始一终亥”据形系联之道;通论三卷,以天地人文日月山谷喜怒好恶……即意义为序论述各字本原;祛妄一卷,专“祛”李阳冰之“妄”,纠其误说;又类聚、错综、疑义、分述各一卷。书中发表个人见解甚多。他并曾以《切韵》四声为序,将《说文》重新编次为《说文解字韵谱》,以备翻检。锴兄铉,字鼎臣,亦精小学,工篆隶,由南唐入仕宋,为太子率更令,累官散骑常侍,尝奉诏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说文》,世称大徐本。凡许慎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为之补录;又有经典相承传写以及时俗常用而《说文》不载者,作为“新附”列入各部之末。凡《说文》具有正体而时俗讹变者,则于注中说明之。每字之下又据孙愐《唐韵》加注反切,使之皆有正确读音。二者相校,铉书简当,间失穿凿,锴多创见,但多巧说衍文。篆文繁略、次序、说解也微有差异,据田吴炤《说文二徐笺异》所列,二本有差异者计一千二百零七条,优绌互见。但经过徐氏兄弟的努力,《说文》总算基本上恢复了原貌。我们今日之所以能看到“始一终亥”本《说文》,确多赖二徐之力,其于许学,功不可没。

然而,在二徐之后,许学又受到多方面的挑战,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总的来说,宋人重理学,轻汉学,藐视许学,视文字为游戏,随意立说摆布之。其间突出的代表人物有三个。一个是政治家王安石(介甫),晚年作《字说》二十四卷,将《说文》抛在一边,全不管六书原理,而以己意说文字,望文生义,信口开河。如以富为同田、波为水之皮、坡为土之皮,诗为寺人之言、讼为言之于公、盟为歃血自明、伶乃为人所令、笃为以竹鞭马等等,虽偶有可取者(如贫为分贝),但多属杜撰谬说。王氏为求新奇而不惜穿凿附会,又甚自信,而且凭借政治势力推行其说,故在当时颇为流行,学者莫敢不传习。另一个是史学家郑樵(1103—1162),以其博洽傲睨一时,所

作《六书略》，凭臆说独断、随意否定许慎旧说。其中的“起一成文图”、“因文成象图”更把一些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弄得离奇古怪，又反过来诋诃许氏“仅知象形谐声二书以成《说文》”。此王郑二人，“皆以巧说邪辞，蛊惑后世，遂开数百年向壁虚造、望文生训之陋习”<sup>②</sup>。再一个也是史学家，叫李焘（1115—1184），将《说文》次序打乱，改编为《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三十卷，依《集韵》次第起东终甲，据形系联的字书一变而为韵书。而且，书中所注反切，也多有窜乱。此书一流行，以讹传讹，竟至有人以为许慎旧本便是如此，“始一终亥”之本反鲜为人知。

在元明两代，《说文》同样被随意改动，许学不仅未得发展，反遭到许多歪曲、误解。元戴侗《六书故》、包希鲁《说文解字补义》、杨桓《六书统》、《六书溯原》、周伯琦《说文字原》、《六书正讹》等书，不仅改变《说文》原有分部，而且增删篆文，随意立说。这些书皆与《说文》有关，而且打着“六书”、“字原”等旗号，虽不能说全然是处，但毕竟错误百出，无益于许学。像《六书正讹》一书，所谓“正”与“讹”，便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喜欢杜撰篆文，而后再据以批评《说文》，将《说文》所载篆文定为“讹”或“俗”。如说“𠂔”为正，“降”为“俗”；“𠂔”为正，“武”为讹；“𠂔”为正，“裔”为俗；“策”为通用，“𠂔”为俗；以“𠂔”为正，“族”为俗；又改“秃”为从儿从禾声，改“妾”为从立从女，改“故”为从久古声，如此等等，简直是把“正”“讹”颠倒，是非混淆了。这是元代的情形。到了明代，情况更糟，几乎无善可述。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自叙》对此有扼要述评，虽过于严厉，大体上却是正确的；沈兼士以“空疏”二字概括明代文字之学，可谓确论<sup>③</sup>。

这种每下愈况之景象，至清代便一扫而光。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学者们都转向经史之学，埋首学术。学者们普遍认为，“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欲求三代之遗，舍许氏无所适从，故都以通《说文》为读古书之锁钥。是以对《说文》的研究成为学术界一时之风尚。许学于是大盛于世，学者辈出，论著如云。

首先，学者们对大徐本《说文解字》及小徐本《说文解字系传》作了大量的校勘、研究工作，使之尽量恢复“始一终亥”的原貌，尽量符合许慎原意。在这方面，钮树玉有“校录”，严可均有“校议”，段玉裁有《汲古阁说文订》，朱士端有《说文校定本》，均为大徐本而作；祁雋（xi）藻（淳甫）、李兆洛（申耆）、承培元、夏灏、苗夔等人为恢复小徐本原貌，亦耗费多年心血。对于二徐本之间的差异也有学者注意研究，比较得失。二徐本《说文》经校订后重印行世；已使许书重放光辉。读书之人，几于家置一编。

其次，在二徐本《说文》的基础上，许多学者穷毕生精力进行全面研究，加以注释、分析，著名的“说文四大家”即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便是杰出代表，他们对许学均有重要贡献。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乾隆举人。他是戴震的弟子,是乾嘉学派中的著名学者,一生著述三十余种,《说文解字注》是其代表作,是他大半生心血的结晶。从属稿到刻印,前后达四十年。这是后世公认的解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此书在阐明许书体例方面,在语言文字学理论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并能提出许多新的看法修订前说,对词汇学、词义学的研究极有裨益。与他同时代的小学家王念孙,对此书极为推崇,认为自许慎之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sup>④</sup>。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书,自非十全十美,亦有其缺点、错误。主要在于段氏盲目尊许和过于自信。但通观全书,所作注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至今仍然是正确的。

桂馥(1736—1805),字东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乾隆进士。著《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每字之下胪列古籍,旁征博引,不下己意,令读者触类自通。从表面看,此书征引群书,或数则,或十数则,不加取舍,似乎杂然纷陈,良莠并存。实际上,正如王筠所说:“桂氏书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辩正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故专胪古籍,不下己意也。”<sup>⑤</sup>除义证外,本书还做了不少订讹补遗工作。

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号蓁友,山东安丘人。道光举人。他以二十年工夫著《说文释例》二十卷,详释《说文》体例,条分缕析,疏通其意,对读者阅读许书,理解许氏原意很有帮助。王氏又著有《说文句读》和《文字蒙求》,前者参考段桂二氏之书,删繁举要,参以己意;后者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类解释小篆二千余字,均便于初学者。有清一代文字学者逾百,王筠是最注意普及工作的一个学者。

朱骏声(1788—1858),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人。著《说文通训定声》,以丰、升、临、谦、颐、孚、小、需、豫、随、解、履、泰、乾、屯、坤、鼎、壮十八卦名分为十八部,排列篆文(除许书原有篆文外,另补入七千余字),解释字义后,详论其转注假借用法。不过,朱氏所谓转注是本无其字,依声记事者;所谓假借是本有其字,依声不必记事者,与许说不同。此书是从音韵角度研究《说文》的一部巨著,其征引广博,足为读者左右获取之资,并可由此而明声义相通之理。

上述四家之书,体大思精,各有特色,使许学大放异彩。特别是段氏《说文解字注》,影响尤为深远。围绕着这部著作,又出现了一批“订补”、“札记”、“考证”、“笺”、“匡谬”之类的专书,如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桂馥《说文段注钞案》、冯桂芬《说文段注考证》、龚自珍《说文段注札记》、徐承庆《说文段注匡谬》、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等等,虽然瑕瑜互见,亦各有独到之处,可谓段氏净友。

第三,清代学者对许学的各个侧面展开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先后涌现出一大批